

一致百虑：“六艺”裂变诸子百家

李万堡, 陈醒芬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 广东 汕尾 516600)

摘要: 诸子终归几家, 诸家如何关联, 又诸子理论渊源何自及如何界定“六艺”之性质等诸多问题, 至今商榷不绝。前有庄子之“六艺说”、孟子之“政治说”振铎, 后有西汉刘安“应世之急”接踵, 然百代独领风骚者莫过于班固之“王官”说, 延及清初章学诚与民国马一浮以“诸子出于六艺说”微澜动水。期间《易》之“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虑”一语当为揭橥此题管键。

关键词: 国学; 诸子百家; 王官说; 救世说; 六艺说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31X(2018)02-0062-06

Consistence and Different Consideration: “Six Classics” as the Fission of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LI Wan-bao, CHEN Xing-fen

(Shanwei Polytechnic, Shanwei 516600, China)

Abstract: So far, many issues are still up for debate on how many are classified for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how they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where these theoretical original come from, and how they define the nature of the Six Classics. Formerly, the Chuang Tzu's “Six Arts Theory” and the Mencius's “Politics Theory” released a caution. Later, in Western Han dynasty, there was another theory, the view of “A need for social problems” by Liu An, also been presented. However, until the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are from Six Classics Theory”, which was presented by Zhang Xuecheng at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and Ma Yifu at the Republic of China, gave some improvement. During hundreds of generations the Ban gu's “Government Bureaucracy Theory” took a lead in all of those theories. In the long course, “Different world has the same destiny, but the path is differen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can achieve the same goal.” the theory in Yi, reveals the key of this problem.

Key words: Sinology;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Government Bureaucracy Theory; Salvation Theory; Six Classics Theory

中华元典“六艺”除《乐经》早佚,其《诗》《书》《礼》《易》之传先于夫子,《左传》屡征。孔门以《诗》《书》《礼》《乐》“四艺”立教。《诗》者,郊庙祭祀“绝地天通”之辞、邦畿燕飨之乐及里巷风谣之歌,言语以引诗、赋诗以言志。《书》者,载先王话语、政令要

事,乃“记言”之史;《礼》者,狭称《仪礼》,乃冠、婚、丧、祭之法,天道人伦之序,序故群物皆别;《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易》者,要事决策,卜而后行。故曰

收稿日期: 2018-03-08

作者简介: 李万堡(1959-),男,黑龙江方正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及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仲尼晚年读《易》，以致《韦编三绝》，又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春秋》者，亦为孔子晚年依《鲁春秋》而删述，故而《易》与《春秋》非孔门立教蓝本。章实斋曰：“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於诵经，终於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繡十二经，以见老子。’荀庄皆出于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於孔门弟子亦明矣。”^[1]

《庄子·天道》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翻十二经以说。”（有云“十二经”乃以六经又加六纬；又云《易》分上下，并十翼而为十二；又云《春秋》十二公经也。）章实斋曰：“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则可以意僭之矣。盖自官师之分也，官有政，贱者必不敢强干之，以有据也。”^[2]“先王典章”即“六艺”，章实斋先言“诸子出于六艺”，继之又依班固之“官师之分”而肯定“诸子出于王官”而“以有据也”。章实斋此论实为淆乱“六艺”与“王官”二说。“六艺说”实为笼统学术之论，“王官说”乃支离学术之说。夏商周三代之思想学术尚在巫史笼罩之下，未曾瓦解分治，故班固之“王官说”乃缘木求鱼，未若庄子“六艺说”为切，查章实斋此论，前后齟齬，不足为训。

儒家元典初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前三者流传较早，《左传》屡征，至汉武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志，列“六艺”之五为官学，设“五经”博士。唐代以《易》《书》《诗》加“春秋三传”再加“三礼”，并称“九经”，也立学官，并以取士；唐文宗又增《论语》《尔雅》《孝经》为“十二经”（实缺《乐经》）。宋朱熹由《礼记》析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为“《四书》”，至此，儒家之“十三经”地位确立。清乾隆镌刻《十三经》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自司马谈以“六家”类聚百家，班固衍为“九流十家”，然后世儒家何得独擅？孔、孟即为诸子之一，即与老庄、墨翟、公孙龙、邹衍、申韩之徒同列，又何得独尊？《论语》《孟子》《大学》无“经”而

“经”，《道德经》却“经”而不“经”，故所谓序经、子之别亦儒家自说自话，有悖中华思想学术之宏旨，亦不足为训。

一、庄、孟振铎而各执一端

诸子渊源，自古众说纷纭，然庄、孟二子可谓振铎天下。孟子依政治立论，影响颇深。“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以为时代使然，社会使然，西汉淮南王刘安深然之，并提出“应世之急说”，其《淮南子·要略》指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本于世变之所急。”

近人孙德谦以为“诸子源于‘六艺’”，肇始意欲“救世”。“今夫春秋以后，周为共主，天下相务于战争，而政异俗殊，人心变诈，故庄子任天，所以诛僭乱之君，欲以返诸皇古之治而革其浇漓之习；墨翟通权达变，其节用、非攻之说，苟善行之可以救奢而却敌；名、法家崇实黜伪，信赏必罚，盖深恶夫世主之是非不辨，功罪不当者，而将以其道易之；苏、张学于鬼谷子，历说诸侯，取富教于立谈，儒者每鄙之为不足道，然禁攻息兵，天下稍免于干戈之患，其功烈亦何可轻议；若夫管氏相齐，一匡九合，商君辅秦，国富兵强，非又成效卓著乎，所谓救世者，此也！”^[3]孙德谦不仅力主“救世说”，还认为诸子源于“六艺”而不缪于孔子，提出“无诸子而圣人之经尊，有诸子而圣人之道大”，“正经为道义渊海，子书为增深川流”。又胡适之“救时说”与孙德谦“救世说”旨趣相投，但胡适反对其“诸子源于六艺说”，并说“其言则无悖于经教”是孙氏全书（《诸子通考》）之“大累”。“似仍未脱儒家的窠臼。他的书受此一个观念的影响真不少！”^[4]

庄子“诸子出于六艺”论，事理较孟子则更为详备，亦非后世刘安堪比。《庄子·天下》论“六艺”曰：“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六艺”之学“其运无乎不在”，而百家却各执一端以自好，不见天地之纯，百家往而不返，天下道术斯裂为诸子讨源更确，可谓揭橥大道。庄子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南朝刘勰亦以庄论为确:“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文心雕龙·诸子》)但庄子只见天下道术之“必不合”之状,而未见其“必合”之势。所谓“必合”者,历史必然。当此任者,乃《吕氏春秋》。

二、“王官说”雄视百代

然诸子渊源论彪炳千秋者,并非庄孟,而是班固。他据刘歆《七略》提出“出于王官”说(《汉书·艺文志》),并直启“新文化运动”。《汉书·艺文志》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法家者流,盖出於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诸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观万方之略矣。”《隋书·经籍志》认同此说。班氏依儒立言,是非未缪于圣人,然后世商榷沓来。其一,诸子“十家”既然为“六艺”之“枝条”,何以独为儒家之经典?其二,诸子虽各执一端,思想彼此渗透,而“王官说”何以武力割裂之。

一般以为班固之论与庄子无涉,一倡“六艺”,一倡“王官”,岂不知二者亦同归而殊途。究庄子与班固二论,并非全然悖谬。《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智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亦言诸

子出于“六艺”,又曰“出于王官”,与其“六经之支与流裔”之论略相龃龉。“王官说”言儒家出于司徒,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此论貌似精到,而实湮没了自家思想之精,遂成世代聚讼的。班固说,诸子若“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其各有优长蔽短,然皆归于六经。若折中诸子,则平天下之道得之。此则司马迁早已有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裁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百家之言,言人人殊,难定于一,然皆“言皇帝”也。修六艺术,观诸家言,舍短取长,司马迁即曰诸子源于《六经》,又曰诸子发展《六经》;即曰诸子之精纯,又曰诸子之偏执,班固接武。惜班固只见“一致百虑”(天下道术裂变),未见“殊途同归”,未出庄子窠臼。“同归”者,即“牢笼百家”者,《吕氏春秋》当仁不让。始皇帝不然,废黜吕学二世而亡,汉文、景二帝尚黄老杂霸而治,孝武帝黜百家则疲敝中国。但班氏竟贬吕氏为“驳杂”并列于“九流”之末,此其大谬。章学诚《文史通义》秉承庄子之说,即战国之文,源出六艺,因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而诸子之书,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毕竟仅得于道体一端。章曰:“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原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言也。”^[5]章学诚之轮出于庄子之辙。章学诚所谓之“道体”即指“六艺”,诸子得于“道体之一端”,即诸子皆“六艺”之流裔。庄子“六艺说”与班固“流裔”论后世鲜为提及,而班固“王官说”则一枝独大。“王官”即当时司掌文化政令之官,王官可谓诸子近源,其渊薮乃在“六艺”,“王官”为“六艺”之流,班固以流代源遂使后世释疑鹊起。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批评班固“强作解事,穿凿附会”。认为班固将诸子起源追述至各具体官守是便于分类,并非确有其事,故不足与辩。

胡适服膺刘安“应世之急说”,他说“已足摧破九流出于王官之陋说矣”,班固“皆附汉儒附会揣测

之辞，其言全无凭据”。胡适以《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辩谬于班氏曰：当下皆受章太炎影响而主班氏之“王官说”，其实皆汉儒附会揣之无凭之辞。如说“间有近于王官之所守”则可，如阴阳家近于古占候之官，“此犹可说也”；古者学在官府，非吏无所得师，“亦犹可说也”。至谓诸子出于王官，“亦大悖于学术思想兴衰之迹矣”。因刘歆之前并无此说，昔人论诸子者莫备于《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论六家要旨》《淮南子·要略》此四书，而此间皆无“王官说”。《淮南子》自“文时，紂为天王之子”以下专论诸家学说所自出，以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故有殷周之争，而太公之阴谋生。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有儒学之弊、礼文之烦扰，而后墨者之教起。有齐国之地势、桓公之霸业，而后管子之书作。有战国之兵祸，而后纵横修短之术出。有韩国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缪”，而后申子刑名之书生。有秦孝公之图治，而后商鞅之法兴焉。此所论列，虽间有考之未精，然其大旨以为学术之兴皆本于世变之所急。其说最近理。即此一说已足推破九流出于王官之陋说矣。其言“官人守要而九流宣其义”，大足贻误后学，夫义之未宣，便何要之能守，学术之兴，由简而繁，由易而赜，其简其易，皆属草创不完之际，非谓其要义已尽具于是也。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6]胡适思想显为孙德谦、梁启超之说遗存，尤其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直启胡适。胡适批评班固“九流十家”之剖判及诸子皆“出于王官”为大缪，直击时下国学界权威章炳麟等，可谓振聋发聩，余英时对此亦评价甚高。

胡适批评班固诸子“出于王官”论，固然通理，然其结论“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亦未得其精。诸子意欲救世，皆其动机，而其思想渊源，胡适并未言明。胡适赞同孙德谦的“救世说”而提出“救时说”，但反对孙德谦的“六艺说”。其实无论“救时”“救世”都与“六艺说”不悖，“救时”“救世”是动机，“六艺”是思想，二者较之，胡当让与孙。班固之论诸子为“六经之流裔”未错，其错在把“九流十家”与“王官”各自对应。胡适否定了班固“王官说”，而又未理睬其“六艺说”，失之肤廓。

三、“六艺”统摄诸子

马一浮精研佛学、宋学，后又由宋学返诸“六经”，提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之说，而其前提即楷定国学名义。“学”者，“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也”，即能洞悉事物表里，并说与他人者，始可名为“学”。而“国”者，有别与外国学术之谓。然此名目过于笼统，依时贤或分为小学、文字学、经学、诸子学、史学等类，大致依四部立名，然四部仅分类法耳。“能明学术流别者，惟《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因时贤楷定泛泛，皓首难明，所以第一须正国学之名，其次先读基本书籍，其三讲求简要方法。马一浮说：“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源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7]故“国学者，六艺之学也”。

国学原指“国子监”之官学，国学之性，今无定论，或与西学有别，今人论之乃相对于“西学东渐”之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学术，别称“汉学”“中国学”。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同时期的先秦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完整之文化、学术体系。马氏楷定国学，固然偏执，然有厘清学术源流之功，其为否定雄视百代之“王官说”而回归“六艺说”。《礼记·解经》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庄子·天下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孔子以人立说，庄子以道立说，马氏认为六艺大旨“莫简于此”。

马氏沿用典籍初称“六艺”而不称“六经”，他说：“《汉书·艺文志》以六艺当六经。经者，常也，以道言谓之经；艺犹树艺，以教言谓之艺。”^[7]孔门立教，“六艺”有两大类，一曰礼、乐、射、御、书、数之基本技能（《周礼·保氏》），二曰诗、书、礼、乐、易、

春秋之典籍传习。《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可见四教本为周之旧制，而《易》藏于太卜，《春秋》本鲁史，孔子晚年始加赞述，可知《易》与《春秋》未列入孔子教学内容。然而“六艺”为何是典籍传习而非基本技能类，自“及门之徒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修《春秋》，可知此谓六艺。马一浮基本思想是“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其约为三门：六艺统诸子，六艺统四部，六艺统西学。

其一，“六艺统诸子”。他认为知此须先明六艺之失。《礼记·解经》“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此为《解经》之论。但马氏认为所谓“失”者，并非六艺之失，而是后学所遗：“‘学焉得其性之所近’俱可适道，其流失者，习也。习有所偏重，便一向往习熟一边去，而于所不习者便有所遗。高者为贤知之过，下者为愚不肖之不及，遂成流失。”^{[7]8-9}班固之某家出于某官，其说关乎政治。若说道家出于史官，然五千言是否周之国史？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何以不言筮豆之事？马一浮“方术”出于“道术”说，胜于班固“九流出于王官说”多矣。与其信刘歆及其弟子班固，不如信庄子：“道家体大，观变最深，故老子得于《易》为多，而流为阴谋，……庄子《齐物》，好为无端崖之辞，以天下不可与庄语，得于《乐》之意为多，而不免流荡……墨子虽非乐，而《兼爱》《尚同》实出于《乐》，《节用》《尊天》《明鬼》出于《礼》，而《短丧》又与《礼》悖……名家亦出于礼……法家往往兼道家言，如《管子》，《汉志》本在道家，韩非亦有《解老》《喻老》，自托于道……其得多失少者，独有荀卿。荀本儒家，身通六艺，而言‘性恶’‘法后王’是其失也。若诬与乱之失，纵横家兼而有之……杂家是得少失少。农家与阴阳家虽处于《礼》与《易》，未流益鄙陋，无足判。观于五家之得失，可知其学皆统于六艺，而诸子学之名可不立也。”^{[7]10}至于何为“道术将为天下列”，马一浮深然庄子之论：“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诸子皆管中窥豹，放大自家“方术”（“道术”即“该遍”之称，“方术”即一家之学），皆成“一曲之士”自然“不该不遍”。而显然此间庄子已指出“方术出于道术”，即“诸子出于六艺”。但后世学者皆醉心于“百家争鸣”之热闹场面，而冷落了诘屈聱牙之“六艺”，见流不见渊，见木不见林，即“后世之学者，

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

其二，“六艺统四部”。经部诸书皆由“六艺”衍生，至宋而足备之。《十三经》中《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九经自当该摄于“六艺”，而“六艺”之旨有“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是为宗经论”，《孟子》道醇而与《论语》并列。就子部而言，马氏以为“春秋三传”不属经部，其与《尔雅》同为释经论。曾子、子思子、公孙尼子诸篇不得名经，然亦同为宗经之论；《尔雅》亦不得名经，但亦同为释经论；《说文》附于《尔雅》“本保氏教国子以六书之遗”。史部首推班马，而二家皆附于《春秋》。“纪传虽由史公所创，实兼用编年之法；多录诏令奏议，则亦《尚书》之遗意，诸志特详典制，则出于《礼》，如《地理志》祖《禹贡》，《职官志》祖《周官》，准此可退。纪事本末则左氏之遗则也。”^{[7]11}后世史学巨制“三通”（《通典》《通志》《通考》）及《通鉴》则“编年记事出于《春秋》，多存议论出于《尚书》，记典制者出于《礼》”。概言之，诸史悉统于《书》《礼》《春秋》之论不虚也。集部之文章流别虽繁，皆统于《诗》《书》。他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文章虽极其变，不出此二门。”又诗教通于书教，故一切文学皆可曰“诗”“书”二“教”之遗。

其三，“六艺统西学”。马氏认为，《易》明天道，究天人之理，当可统自然科学，《春秋》明人事，研人类社会之理，大凡人文社科皆可统之。然《易》为《春秋》之本，不明乎《易》，则不能明《春秋》，故一切数学、物理皆《易》之支于流裔。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哲学之本体论近于《易》，认识论近于《乐》，经验论近于《礼》；唯心者《乐》之遗，唯物者《礼》之失。马氏还征引“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诗》教主仁，《书》教主智，合仁与智，岂不是至善么？《礼》是大序，《乐》是大和，合序与和，岂不是至美么？《易》穷神知化，显天道之常；《春秋》正名拨乱，示人道之正，合正与常，岂不是至真么？诸生若于六艺之道深造有得，真是左右逢源，万物皆备。”^{[7]15}马一浮此“三统说”，良莠杂陈，“六艺统四部”似略有牵强。“六艺”既为元典，而又裂变诸子，诸子又衍生“经传”，“经传”又条分“四部”。文章流别，层层转进，若言“六艺统四部”得义理，一如今世之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皆可统于“六艺”岂非穿凿虚无者何？“六艺统西学”又殊难索解。文明异域，各原其源，

进化同理,思致逻辑亦为“殊途而同归”,而马氏如此穿凿中西,确有夜郎之嫌。然马氏上窥庄子,下该诸学,盖因“六艺”直启诸子,以“六艺统诸子”殊为确当,亦与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暗合。但马一浮列章实斋为班固一脉则立论未稳。班固见流不见渊,割裂诸子。章实斋为之讨源,统合道术,回归庄子。

章论诸子皆“六典之遗言”,又“六经皆史”,亦即马论之“六经统诸子”,两论殊途同归。“王官”不能代替“史典”,“史典”不可割裂为“王官”,盖上古之世,时值文化浑然天成,文史哲思本无边鄙,其一切坟典或曰“史”可解。如班固并列司徒、史官、羲和之官、理官、礼官、清庙及行人之官,淆乱中古官制衍生之源流。以章、马二氏为代表者,否定“官职”狭论,以“史典”为源,切中肯綮。

参考文献:

- [1]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经解上[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89
- [2]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经解中[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9
- [3] 孙德谦.诸子通考[M].长沙:岳麓书社,2013:序1
- [4] 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3[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29-430
- [5]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上[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58
- [6] 胡适.胡适学术论集(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1:591-596
- [7] 马一浮.泰和会语[M]//马一浮.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一浮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刘鑫)

(上接第35页)

其次,利用“旅游+销售”模式,开发特色产品。如在龙门石窟、白马寺等著名景区可以销售特色牡丹花茶,在老君山、鸡冠洞、龙潭大峡谷、黛眉山等较知名景点可以开发当地的特色产品,以旅游带动农产品的营销并实现“互联网+旅游+农产品”的对接。

最后,鼓励全媒体营销,创建地理品牌。例如,洛宁苹果、伊川小米、汝阳香菇、新安樱桃和朝天椒、偃师葡萄等农产品在当地都比较有名,但是在洛阳之外却知名度较低。因此,应加大对当地自有品牌的宣传,通过微信、微博、广播、电视等方式实现多渠道营销。

参考文献:

- [1] 张南燕.农商互联引领“互联网+流通”创新实践[N].国际商报,2016-10-20(02)
- [2] 马蓉,张仙,朱克西,等.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探索[J].经济师,2014(8):76
- [3] 吴俊红.“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农业经济,2017(7):115-116
- [4] 刘琦.供应链关系稳定性因素对其绩效的影响研究[D].宁波:宁波大学,2014
- [5] 张莉,郝美存.供应链环境下生鲜农产品物流运作模式[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41-44
- [6] 刘贝贝.洛阳市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对策研究[D].洛阳:河南科技大学,2015

(责任编辑:李海霞)